

## 谈谈《金瓶梅词话》成书及其他

杜维沫

在我国小说史上,产生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金瓶梅词话》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典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即由以民间集体创作为主流的阶段转入了以文人个人创作为主流的新阶段。

关于《金瓶梅词话》的创作情况,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早在五十年代,《文学遗产》曾发表潘开沛、徐梦湘、张鸿勋等同志的文章,对此问题进行过讨论<sup>①</sup>。最近,《杭州大学学报》又发表了徐朔方同志的《〈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一文<sup>②</sup>,论证《金瓶梅词话》“不是个人创作,它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样,都是在民间艺人中长期流传之后经作家个人写定的”,这和潘开沛同志的意见相一致。我是赞同徐梦湘、张鸿勋两同志的亦即一般公认的旧说,以为《金瓶梅词话》是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家个人的独立创作。

这里,不妨将《金瓶梅词话》作为作家个人创作的理由申说几点。

第一,《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书在成书之前,民间长期流传的有关故事传说、戏曲、平话数量很多,现在我们仍能看到不少作品,其中内容较丰富的便是这些长篇小说最后写定者进

行加工再创作的主要依据,如《三国演义》之与《全相三国志平话》、《水浒传》之与《大宋宣和遗事》、《西游记》之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金瓶梅词话》也是百回大书,内容涉及的范围很广,且成书时间较《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书为晚,如果它成书之前也有大量有关的民间作品流传,我们今天不会一点儿也看不到这类作品的遗留。

第二,《金瓶梅词话》确有少数地方所写内容与某些流传的话本内容雷同,如第一回的开头同于《清平山堂话本》收录的《刎颈鸳鸯会》之“入话”,第三十四回西门庆对李瓶儿讲的阮三一案同于《清平山堂话本》收录的《戒指儿记》,第七十三回薛姑子宣佛法讲的故事同于《清平山堂话本》收录的《五戒禅师私红莲记》,第九十八回陈经济和韩爱姐的故事同于《古今小说》第三卷《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等。但这些地方并不足以说明《金瓶梅词话》本身原是平话。我们从《金瓶梅词话》这几回的具体情节描写来看,作者对话本的故事内容或多或少都作了改动,使之服从于他的作品的需要,所以这些地方应都是作者有意移用现成材料,像他有意移用《水浒传》的几回文字那样。

第三,不错,《金瓶梅词话》吸取了许多当时民间流行的词、曲、韵语,在表现形式上还常以民间说话艺人的口吻插入旁白。然而,这两个方面也无法证实这部小说不是个人创作;我们如果说作者平时留心搜集民间作品,爱好民间文学,并有意模仿受群众欢迎的平话这一艺术形式,那么,这两个方面反过来又都可以作为有力的例证。

第四,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相比,《金瓶梅词话》对人物和环境的细节描写是大大前进了一步,从它的语言和文章风格来看,个人创作的特点也很突出。

第五,从全书的结构看,由民间说话演变来的长篇作品往往仍

有若干大小段落联缀的痕迹，如《水浒传》一百零八个英雄人物的出身故事等，而《金瓶梅词话》的故事却是浑然一体的。潘开沛同志认为《金瓶梅词话》本身就是平话，他把全书分为三截，并说：“原编撰人的目的，只是打算把《水浒》里的武松杀嫂的故事，加以扩大而已；全本书，原来至多编撰到八十七回‘王婆子贪财受报，武都头杀嫂祭兄’就完了。……从全书写作技巧或编撰技巧来看，以前五十回为最好，虽然尚存在若干小问题。可能最初只有这五十回，以后才由别人续作。五十一回至八十七回问题最多，也许就是参加编撰的人较多的表现。八十八回以后的十三回，便差得多了。”这一论断并不合乎作品的实际。徐梦湘同志已指出：“《金瓶梅》第二十九回西门庆叫吴神仙给他家中人相面，吴神仙对每人都说了四句诗，这四句诗就包含了每人的结局。孟玉楼、孙雪娥、春梅、西门大姐等人的结局都在八十七回之后，而吴神仙的诗中都有了暗示，这又可证作者本有计划，决非是什么艺人因听众不满足而续成。”我觉得，徐梦湘同志所举的例证颇有说服力。我还可以补充第四十六回的“妻妾笑卜龟儿卦”为例，在这一回里，作者通过卦帖儿上的图画和算卦老婆子对图画的解释，再一次交待了吴月娘、孟玉楼、李瓶儿各自一生的命运、结局。吴月娘是书中主角之一，她的结局也在八十七回之后，而且她在八十七回以后的故事中是比以前显得更加重要的人物。我们读着第二十九回相面的故事情节和第四十六回算卦的故事情节，很容易联想到《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在太虚幻境看“薄命司”的卷册、听演“红楼梦曲”的故事情节来，也许《红楼梦》的作者正是从《金瓶梅词话》这种艺术手法得到了启发。这种艺术手法的运用，说明作者对小说故事发展的全过程胸有成竹，他在着手进行创作之前，对小说的整个布局是作了精心设计的。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讲到《金瓶梅词话》的主题思想和艺术成就时说：

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至谓此书专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搢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

这是非常全面而又非常精确的评价。本来，《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把小说的故事背景假托于宋代，并借《水浒传》中西门庆与潘金莲的遇合将故事展开，这原是他为自己的作品所涂上的一层保护色，正如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借空空道人之口声明他所写的故事“无朝代年纪可考”一样。明代沈德符在其所著《野获编》中说《金瓶梅词话》的写作主旨是有意“指斥时事”，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序》中也说这部小说的写作是“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小说以西门庆一家为中心，把上至朝廷皇帝宰相，下至市井流氓无赖巧妙地连成一体，用辛辣生动的文笔真实地表现出明代后期腐朽透顶的典型社会环境中的一系列典型人物，从而揭露了这个社会的种种黑暗和罪恶，客观上预示了这个社会再也无法继续维持下去的必然崩溃的命运。我们只要注意小说写西门庆这个集官僚、恶霸、富商之特点于一身的典型人物怎样由巧取豪夺、贪脏枉法而一帆风顺地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便不难体察到作者对社会现实所持的批判态度了。

不过，《金瓶梅词话》与《红楼梦》有所不同，或者说它比《红楼梦》究竟略逊一筹，那就是它只写了生活的黑暗面，我们在全书中几乎找不到一个正面人物，看不到一线光明。全书贯穿着的是作者十分落后的宿命论思想，作者批判现实的武器似乎也只是佛教

的因果报应说，而且作者对现实生活中受压迫最重的妇女完全是以封建统治者的目光去进行观察和塑造的，这就不能不限制着他对社会黑暗揭露和批判的深度。

在艺术技巧上，《金瓶梅词话》对我国古代小说的艺术传统作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它的白描手法十分突出，善于通过人物自身的语言和行动来刻画人物的性格、揭示人物的精神面貌，因而能把人物写得栩栩如生。它对人物活动背景的描写，较之以前的作品更加细腻、更加注意衬托人物的思想和个性。它运用方言土语似乎信手拈来而恰到好处，使得文章酣酣淋漓，大大增强了表现力。清人刘廷玑曾称赞《金瓶梅词话》的文章之妙说：“深切人情世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文心细如牛毛茧丝，凡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读之，但道数语，便能默会为何人，结构铺张，针线细密，一字不漏，又岂寻常笔墨可到者哉？”是的，一部小说能够使读者感到它所塑造的人物仿佛呼之欲出，能够使读者“掩卷读之，但道数语，便能默会为何人”，这样巨大的艺术效果，绝非只会照抄生活现象的平庸作手之“寻常笔墨”所可取得的。

所以我们应该肯定，《金瓶梅词话》虽在局部描写上有过于琐碎、重复的自然主义的缺点，从全书总的成就来看，它不愧为我国小说史上第一部个人独创的现实主义的长篇杰作。它所提供的丰富的创作经验，为后来《红楼梦》所代表的我国白话长篇小说艺术高峰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遗憾的是，我们今天仍不知道《金瓶梅词话》的作者究竟是谁。沈德符《野获编》提到《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时，只说了这么一句话：“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现存《金瓶梅词话》的最早刻本，书前有欣欣子所作、不署年月的《金瓶梅词话序》和东吴弄珠客作于“万历丁巳（万历四十五年，1617）季冬”的《金瓶梅序》，前一篇序文的开头一句话是：“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根据这三条

材料，证以《金瓶梅词话》中所使用的大量山东方言，我们现在只能确切知道：我国这位最早的白话长篇小说的杰出作家是山东兰陵（今枣庄市）人，他生活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他的笔名是笑笑生。

红学家们常常慨叹历史上留下来的有关曹雪芹的文献实在太少，而《金瓶梅词话》作者的遭遇比起曹雪芹来就更加不幸。由于沈德符的“嘉靖间大名士”这句话，清代张竹坡评本《金瓶梅》和清人的一些笔记就把《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归之于嘉靖时的著名文学家、江苏太仓人王世贞，且附会出什么“苦孝说”来。这种荒唐可笑的附会说：王世贞的父亲王忬被严嵩、严世蕃（或者加上唐顺之、或者加上汤裱褙）陷害致死，王世贞就写成《金瓶梅词话》，在书角涂上毒药，把书献给严世蕃（或改为唐顺之），企望毒死严世蕃（或唐顺之），为父报仇，等等。吴晗同志在三十年代初曾作《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长文<sup>③</sup>，根据大量史料，经过细密考证，对王世贞作《金瓶梅词话》以及有关的种种附会都给以全面的否定。1979年，朱星同志在《社会科学战线》发表《〈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一文，仍论定《金瓶梅》的作者为王世贞；本文上引徐朔方同志的文章，则论证李开先是《金瓶梅词话》的最后写定者。我认为，徐朔方同志的论证颇有道理。李开先是山东章丘人，嘉靖八年进士，曾任太常寺少卿，因受严嵩一流人排挤，不满朝政，罢职闲居；他又是戏曲作家、民间文学的爱好者和搜集整理者。或许李开先就是《金瓶梅词话》的创作者吧？这个问题需要古典文学研究者再作进一步的探讨。

由于受时代风气的影响，《金瓶梅词话》中夹杂着不少淫秽的描写<sup>④</sup>，所以它一向被目为淫书，直到今天依然限制着我们对它的研究和借鉴。明末崇祯年间刊行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对词

话本的词曲、方言、回目作了通盘的删改，同时重点删改了第一回、第八十四回，但对淫秽描写则未作改动。清初康熙年间刊行的张竹坡评第一奇书本《金瓶梅》，基本上是沿袭崇祯本而又将每回回目缩为四字对文。这两种本子的文字读起来是顺溜了，人物对话中原来难懂的方言土语因被改为一般语言也好懂了，回目对仗也工整了，然而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却都大大减低了<sup>⑤</sup>。民国初年存宝斋铅印的、卷首有清同治三年蒋敦艮“序”和王昱“金瓶梅考证”的《绘图真本金瓶梅》，是第一个删除了淫秽描写的删节本。但这种删节本是在张竹坡评本的基础上删节的，它除删节淫秽描写外，对全书文字也胡乱加以增删。后来流行较广的所谓“古本金瓶梅”、“孤本金瓶梅”等等，又都是这种胡乱增删的“真本金瓶梅”的翻印本，这类本子的文字与《金瓶梅词话》文字之距离，真不啻十万八千里！

郑振铎同志在《谈金瓶梅词话》这篇名文<sup>⑥</sup>中，针对上述各种伪造的“真本”、“古本”、“孤本”写道：“我们所希望的并不是那末一部‘作伪’的冒牌的东西，而是保存了古作、名著的面目，删去的地方并不补充，而只是说明删去若干字、若干行的一部忠实的删本。”“好在我们如果除去了那些秽褻的描写，《金瓶梅》仍不失为一部最伟大的名著的，也许‘瑕’去而‘瑜’更显。”他并曾自己动手，将《金瓶梅词话》校点、删节了三十三回，发表于《世界文库》。

据知，《金瓶梅》在世界上已有十几种文字的二十多种译本，大部分是根据张竹坡评第一奇书本节译的。我觉得，现在很有必要出版郑振铎同志所期望的《金瓶梅词话》的“忠实的删本”，其做法是：用书前有东吴弄珠客作序的明万历刻本《金瓶梅词话》之影印本为底本<sup>⑦</sup>，参考明崇祯本及其它有关资料对原书加以标点、校勘；凡删节原文处，均注明删节字数，凡改动原文处，均作出校记。这样的校点整理本的好处至少有以下几点：一，原书的衍夺讹舛得

到校正,即可免除一般阅读时的麻烦;二,通过校记可以看到除开淫秽描写的明万历刻本《金瓶梅词话》的原貌<sup>⑤</sup>;三,便于我们进一步研究这部世界名著创作上的优缺点;四,便于国外学人对原作准确的翻译和介绍。有了这样的校点整理本,各种所谓“真本”,“古本”,“孤本”就会相形见绌,不可能再鱼目混珠地长久混下去了。

1981年1月

## 注

①潘开沛:《〈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见1954年8月29日光明日报。徐梦湘:《关于〈金瓶梅〉的作者》,见1955年4月17日光明日报。张鸿勋:《试谈〈金瓶梅〉的作者、时代、取材》,见《文学遗产增刊》第六辑,作家出版社1959年5月出版。

②见《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③吴晗同志此文最初发表于1933年出版的《文学季刊》创刊号,1956年收入三联书店出版的《读史札记》。

④在未有刻本之前,《金瓶梅词话》作为抄本流传时就夹有淫秽的描写,万历三十七年(1609)沈德符从袁宏道弟袁中道处借抄一部,有人劝沈交书贾刻板行世,沈不肯,并说:“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晓,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我怎能因刻印这样的书而得到下地狱的报应呢!)”。朱星同志在《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4期发表《〈金瓶梅〉的版本问题》、《〈金瓶梅〉被窜讹的经过》两文,提出《金瓶梅词话》抄本和初刻本的名称是《金瓶梅》,且都无淫秽语,所述理由很难成立。

⑤本文限于篇幅,不能列举三本文字之异同。吴晗同志的《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曾引《金瓶梅词话》第七回孟玉楼与张四舅对话中“朝廷爷一时没有钱使,还向太仆寺支马价银子来使”的话,证以《明史》,认为朝廷向太仆寺大量借支马价银是万历十年以后的事,故《金瓶梅词话》成书时间不得早于万历十年。这句话在张评本中被删去了,于此即可见删改本与《金瓶梅词话》本价值之高低。

⑥见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中国文学研究》(上)。

⑦《金瓶梅词话》三十年代初于山西发现,归藏北京图书馆,1933年曾以“古佚小说刊行会”名义影印,1957年文学古笈刊行社据影印本重印。此书书前有欣欣子序、东吴弄珠客序、廿公跋,一般认为是接近原作的万历年间刻本。

⑧郑振铎同志标点的三十三回,只用崇祯本校勘,《世界文库》发表时附有校记。1935年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的施蛰存同志标点的《金瓶梅词话》删节本,未作校勘。